

SHI HUI DE FAN FU

被忽略的繁复

当下「底层文学」讨论的文化研究

滕翠钦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被忽略的繁复

当下「底层文学」讨论的文化研究

◎ 滕翠钦 著



谈自己心目中的
为社会中的
置而斗争、或者更确
地洗，为重新占有语
号学的范围而
所有社会运动
具有决定性的
些词还可以用
物

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谈自己心目中的
为社会中的
置而斗争、或者更确
地洗，为重新占有语
号学的范围而
所有社会运动
具有决定性的
些词还可以用
物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忽略的繁复:当下“底层文学”讨论的文化研究/滕翠钦
著. —2 版.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 8
ISBN 978 - 7 - 5426 - 4683 - 5

I. ①被… II. ①滕…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
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7671 号

被忽略的繁复——当下“底层文学”讨论的文化研究

著 者 / 滕翠钦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陈志皓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0.3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4683 - 5/I · 843

定 价 / 2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56475597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观者的策略:底层问题 中的知识分子身份形式	4
	第二节 “客观”的幻象:“底层经 验”的表述与被表述	19
	第三节 文学想象:“底层”被表述 的必要方式	32
	第二章 风格狂想曲:“底层文学” 的“现实主义”限定	46
	第一节 不老实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含混意义	46
	第二节 不朽的“现在”:社会现场 对于底层书写的重要性	55
	第三节 一个本质“姿态”:“批判 性”对于“底层文学”的意义	65
	第四节 “他者”的群体面相:“现 实主义”文学的书写对象	76
	第三章 现代物质“乐观”式传奇的 退场:“底层”的物质想象	88
	第一节 反思“物质”寓言:“现代 性”之后的“底层”的物 质角色	92
	第二节 从“异化”到“苦难”:八九 十年代和当下“底层”的 物质观	109
	第四章 非革命、非理想和社会性: “底层”的日常特性	126
	第一节 “同一性”的去圣化:“底 层”日常和“人民”日常	130

第二节	回归社会结构：“底层”的日常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常	148
第五章	“阶级”和数量崇拜之外：底层的群体观	168
第一节	“阶级”抑或“阶层”：“底层”的群体特质	172
第二节	被规训的数字浪漫：“底层”人口的社会学意味	186
第六章	另外一些可能：底层文学、纯文学和大众文学	203
第一节	流转的文学“现代性”：底层文学和纯文学	206
第二节	关于“深度”秩序的内容和形式：现实主义和纯文学	218
第三节	不止是断裂：底层文学和大众文学	228
结论		246
附录一	“底层”：术语的有效性	249
附录二	“批判理论”的内证：永恒批判、审美批判与世俗批判	267
附录三	关于消费社会中“饥饿”的文化研究	285
参考文献		298
后记		324

第一章 绪论

被称之为“底层”的并不是生物学现象，而是一种社会事实，是话语表述的结果，经济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等等各家各户都会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谈谈自己心目中的“底层”。为社会中的语言位置而斗争，或者更确切地说，为重新占有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范围而斗争，对所有社会运动来说，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词汇可以用来起动各种事物和关系，假若失去了这个把握，那么这种概念也就失去了它们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同样，“底层”这一词语的出世，是社会领域的一次不折不扣的精神转型，这种朝气蓬勃的转型唤醒了许多曾经被持久遗忘的卑微者的人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和“大众”作为表达中国民众集体生存状态的核心名词，掩盖了“底层”所喻指的生存风格。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是历史的本质，漫长的历史中那些带有传奇般开端和结尾的社会组织形式都是由于没有发现“人民”的历史力量而走向必然的衰亡。人民主体性的生成，是新的历史形式的开端。“人民”这一关于“群体”的神奇语汇，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产生强劲的规范。

用“底层”取代“人民”命名人群的生存特征，预示着原先被“人

民”概念遮蔽的社会事实重新得到人们的审视；当然这种审视的角度本身是有历史性的，它暗示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具体的社会脉络开始悄悄长出新的样子。尽管“底层”所指称的“现实”群体一直是漫长历史流程中的老意象，在当下的底层讨论中，有人也将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底层形象追溯到久远的《诗经》时代，这是讨论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人们在这些相似性中寻找阐述的理论广度。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结构性的社会群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却联系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原因，对历史具体性的忽视终归导致蹩脚、任意的张冠李戴。因为每一个时代、甚至每一个人都有其不可取代的自我特性，所以，虽然身穿古代服饰、操一口流利古代汉语的贫困群体老早就出现了，但是可以肯定，当下的“底层”仍然是一个崭新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术语开始传达出当下人们对特定历史空间的独特表达。具体地说，某种程度上，这些表达是由当下全球资本主义逻辑孕育出来的，这场大范围内的轰轰烈烈的经济和物质领域的大狂欢并没有像有些人预想的那样，让人们迷失在可怕的身体欢愉中，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要在社会奢华景象的背后辨认出发展带来的弊端以及全球化时代“底层”的困惑和挣扎。

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底层”不存在葛兰西理论语境中“隐语”的色彩^①，“隐语”意味着这种表达的非正式性，带有某种无奈的气息，它的语义空间可以被其他主流语汇所取代，只要现实语境的允许，这个被临时借用的术语必须随时出让自己的表达权。但是，现在的“底层”已经变成了光明正大的术语，它牢牢地抓住表述的特色，树立自己表情达意的品牌。从“人民”到“底层”的转变，是政治学意义上的阶级到社会学意义上的底层——在当下具体的社会应

① 参见附录一《底层——术语的有效性》中关于“底层”在葛兰西语境中具体意义的论述。

用中至少形成了这个共识,“底层”这个概念实际上具备很强的模糊性^①,缺少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精确性。但本文论述的前提是建立在当下别人已经将“底层”看作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的前提下。这种阐述策略的转换当然不是一种轻率的更改,其背后蕴含着一系列社会风格的潜在变迁。“人民”和“底层”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结构性的差异,譬如说数量问题、二者对物质的态度、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差异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仅仅局限在中国的社会语境,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地域理论都对那些类似于“底层”的术语和“人民”做出本质的区分,例如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笔下的“人民”和“庶民阶级”这两个术语就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他认为,“包括在这范畴内的各种社会群体和成分,体现着全体印度人与所有那些被我们称为‘精英’的人之间的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差别。”^②这些词汇的相似性是从它们和“精英”相比较中获得的。在中国的语境中,这两个术语之间的更替却意味着认知范式的转变。但“底层”和“人民”之间却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将人重新置入社会群体中审视,“社会个体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断言的那样是历史的出发点。”^③纯粹的个人是一种固执的幻觉。人们曾经总是疑虑“集体主义”或是落后的原始主义,或者就是万人一致振臂一呼的邪恶的法西斯,现在,“底层”等群体总算从这些传统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人们总算接受“群体”是认识人的社会性的更好平台。

根据刘小新的梳理,“近期人文知识分子的底层论述大约有四种方式。一种是口述史、访谈录、田野见闻以及对与自我相关的底

① 关于“底层”这个概念所指的模糊性,参见本书“附录一”。

② 拉纳吉特·古哈:《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张云等、林德山译,选自刘健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③ [南斯拉夫]米洛斯·尼科利奇:《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赵培杰、冯瑞梅、孙春晨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

层经验书写……第二种是对‘底层’研究的国外理论资源的译介……第三种是对当前底层文学写作的批评……第四种是结合中国语境的理论阐述。”^①本书的绪论主要是通过当下文论界对底层问题关注角度进行梳理和阐发。这些角度包括：知识分子和底层的关系，知识分子关注底层是否意味着知识分子对自身的社会责任做了重新调整？在这种调整中，“反思”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讨论“底层”能否影射知识分子的道德状态？当下“底层”概念的出现说明了知识分子以怎样的眼光审视“现代化”问题？人们是否对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社会存在着理想记忆？“底层”被表述是否合法？这种追问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人们提出了“底层”可以“自我表述”的“哪些”方式？这些方式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而认为“底层”可以“被表述”的人又持有怎样的有利理由？这种观点的内部是否存在分裂？人们为何对“底层”出现在文学中忧心忡忡？那些热烈欢迎“底层的文学表述”的理论家又是为什么对自己的坚持深信不疑？本人对所涉及的他人的观点不做“对错”和“褒贬”判断，而仅仅只是分析这些观点背后隐含的丰富的语义空间。在绪论的最后，我还将具体提出本书的论述角度和论述的总体逻辑。

第一节 观者的策略：底层问题中的 知识分子身份形式

知识分子表述“底层”，或者说是“底层”重新进入知识分子表述的视野，到底意味着知识分子阶层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规定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呢？尽管“底层的自我表述”变成了一则关于理想社会的重要构想，但是“底层”问题的重新升温，重要的不是说在某个特定时空中“底层”阶级的生存状态得到何种程度的真实

^① 刘小新：《近期文论中的底层论述略》，《福建论坛》2006年第2期，第6页。

反映,而是在于底层作为一种话语资源表现了知识分子阐述这个问题背后所隐含的叙述策略,这些策略形成全新的解释范式,和这之前的历史诸阶段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延续和断裂,这些复杂的关系暗示了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的内涵。这种分析不仅仅使我们可以认清拥有话语权的一方的叙述策略,更有助于厘清表述和被表述双方之间的关系在新的社会趋势下呈现出来的别样的关系模式。这些话语拥有者主要是指知识分子阶层,当然关注底层的并不仅仅只有这个阶层,而且这些阶层之间本身就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观念。对“底层”这一社会形象的关注和认真表达实际上不是认识论层面的问题,有关“真和假”的激烈争执将让位于对话语表述背后意图的深层分析。

“知识分子和底层”是中国社会“隐形的二元结构”(南帆语),这个结构对众多历史叙述做出颇多强制规定,成为人们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不可回避的身份原型^①,它是阐述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一条重要脉络。或者知识分子是作为精英的形象出场,对民众展开智识的启蒙;或者民粹主义倾向占据主导地位,“知识分子”成为落后的社会身份,“革命话语的历史叙述取消了知识分子的精

① “1905年的废科举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广泛社会后果。在乡村造成办学主体由私向公的转变,减弱了民间办学和就学的积极性。新学制对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有所排斥,导致乡村读书人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而乡民对新教育传播的‘知识’却不那么承认,使新学生在乡村中不受重视,流向城市寻求发展。乡村读书人心态也开始转变,厌弃固有生活,甚至轻视农民。随着城乡的分离,在都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和失去读书人的农村都成为受害者。”(罗志田:《科举制度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91—204页。)知识分子开始从“民族性”和“国民性”中寻求表述国家命运的最佳形式,科举制度的废除可以说是釜底抽薪的举措,人们希望现代知识形式和观念可以沁入人心。但也可以看出,在社会现实层面,对传统教育体制的“大拒绝”存在着另外一种相反的影响,现代知识恰恰和民众现实经验相背离,反而丧失了原有社会体制的固有优点。可见,那时的某些知识分子所构想的民众脱离现实。追求“现代化”,将“城市”这一空间寓言化,“乡村”必然成为落后的象征。所以,那时的白话文对于乡村来说缺乏现实感,也正是因为这样,知识分子的努力就有点一厢情愿,尽管出发点堪称高尚。

神导师资格；大众的革命狂欢之中，他们被甩在历史之外，凝固成一个保守的、懦弱的、患得患失的形象。”^①这个被塑造出来的事实也逐渐被知识分子自己所接受，正如穆旦在自己诗中的自白：“就这样，象只鸟飞出长长的阴暗甬道，我飞出会见阳光和你们，亲爱的读者；这时代不知写出了多少篇英雄史诗，而我呢，这贫穷的心！只有自己的葬歌。没有太多值得歌唱的：这总归不过是一个旧的知识分子，他所经历的曲折；他的包袱很重，你们都已看到；他决心和你们并肩前进，这儿表出他的欢乐。就诗论诗，恐怕有人会嫌它不够热情；对新事物向往不深，对旧的憎恶不多。也就因此……我的葬歌只算唱了一半，那后一半，同志们，请帮助我变为生活。”^②知识分子必须在向民众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完成对自身固有的精神缺陷的摒弃。旧知识分子和新知识分子的称谓某种程度上说是从“新旧中国”的说法中得到启发，对死亡和新生等生理现象的借用总是包含了人们对新的历史现象和新的身份可能具有的强大生命力的期待。

人们必须承认，不管知识分子的身份是高尚或是卑微，他们一直都拥有表述的权力。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的表述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前提，他们之间的不同源于立场的差异——是从自身或者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对立，精英主义事实上是民粹主义潜藏的逻辑，或者说，精英主义是民粹主义的一种镜像。二者的关系就像‘人民崇拜’与救世主意识，个人对‘大众’的负罪感与英雄对‘群氓’的优越感一样，从来都不曾分开过，它们内在成为完全相融的一体。一个处于现代化转型中的社会，准备好了动员对象——中下层社会成员或所谓

① 南帆：《导言 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选自《后革命的转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② 穆旦：《葬歌》，选自张志民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诗集（1949—1966）》，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84页。

‘大众’、‘人民’，积累了足够的忿恨和不满，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精英阶层的全情投入和精心设计（不管是出于精英间的竞争需要，还是该阶层某些成员的自觉意识），民粹主义不可能成为一把批判的利器，形成那样强大的对现行体制的冲击。”^①所以，对知识分子立场确立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源于霸道的独断，而不是活生生的经验事实。那些惧怕像鬼一样残忍的群众面孔的知识分子和那些将群众视为人类希望的源泉的人们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这两种群众实际上是一伙的。于是，立足于关心经验中的“底层”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注意让自己远离这些无谓的争执。

当下知识分子对“底层”的关注产生了一些新的话语图式。要认清这些图式的特性，我们首先要先了解“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精英背后蕴含的一系列话语背景。在建国后的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被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锻炼成“规矩”的形象，他们的言说中也带上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这里的“浪漫”包括国家话语对社会现实复杂性的有意规避，以试图完成意识形态对民众观念的塑形。这样，知识分子实际上处于边缘位置，和国家整体构成共生的关系。知识分子面对的不是复杂社会事实，而是充满深刻意图的统治形式，这些形式由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大事件和大运动构成。这样，知识分子实际上处于“失语”的状态，“所谓‘失语’，并不是知识分子真的丧失了他们学术表达的话语能力，重要的是，他们丧失了对自己生存方式和价值的自我解释能力。”^②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经历了从“他者”回归话语中心的过程，伴随它的是将经济建设为主的现代化形象全面“神圣化”的过程，这也是人们将理想主义置于现实主义之

① 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

② 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上的过程。于是,在人们的观念中,群体丧失了作为历史主体的光环,尽管“人民”这个词汇仍然作为国家总动员的关键词汇,但有关群体的表述却更加多元了,知识分子由此同时获得了充分的自我身份。这时的知识分子关注“底层人生”不可避免地带有身份的优越感,也正是这种过分的理想主义,导致了某些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后期重新回到书斋,在封闭的空间里想象精神的纯粹。重新关注底层表明知识分子要从目不窥园的沉寂中跳脱而来,预示着这个智识群体对“现代化”的评价进入了新的阶段,而且这种介入现实的方式是极其严肃的。在这些人看来,那些关心物质奇观、向往日进斗金的现代神话的现实是相当荒唐、浅薄和愚蠢的,而且这也说明知识分子原来对“底层”怀有的看法开始瓦解。

八十年代的主体转型和人们对主体失落的疑虑深刻的联系在一起,更确切地说,是反思主体和实践主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个人的自由化必然导致精神的焦虑。“八十年代后期,理想主义的激情在悄悄撤退,撤退的标志在于,个人对世界不用进行纯粹精神的探索,乌托邦受到怀疑和拒绝,超越此在的努力成为一种徒劳无益的行为,生活还原为一种人的日常性存在,琐碎而又艰辛的日常生活磨损并淹灭了人的精神追求,对现实的抗争转化为与现实的妥协与无奈认同。”^①但真理不应该在接近历史和社会现实时就开始消失。社会批判依靠哲学不能进行到底,因此,社会批判成为了社会历史实践的使命。当“反思”成为社会必要姿态时,人们试图防止人类心灵处于万事大吉的安逸状态。“追溯‘批判’的词源,在希腊语‘crinis(意为分开、决断等)’的含义上进行考虑时,‘反省的反省’这种连续的不间断的无限性的思维活动就变成了非决断的、优柔寡断的、非批判的行为。在不堪忍受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时,打破这种状态,

① 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做出决断的批评就呼之欲出。”^①批判性体现着现代性思想活动超越的和激进的特征,它蕴含着知识精英变革现实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烈愿望^②。现代性总是伴随人们强烈的危机感与变革意识,他们始终怀着对现实不满以及对未来的理想化,但在这些社会批判者看来,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恐怖恰恰来自于他们的精神形而上学,对某个事物固守和忠诚恰恰是因为其力图避免历史的时间流逝,并且想象他们所追求的东西的恒久性。

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精神“原点”的追求在现实生存中变成了巨大的荒谬,在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者看来,这种原点只能作为现实的幽灵烘托现实的合法性。当下的“反思”不但批评理想主义,而且反对绝对务实的自由主义,因为这些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只能是通过说服而非武力的连续性的渐进的改良实现的,社会是一个有机体^③,各个部分都各司其职、不可或缺。这种观点带有很强的保守主义的色彩,主要是在理性主义逻辑深刻地介入到了现代的自由主义思潮当中^④。人们反对现代自由主义,用理察德·罗蒂的

① [日]初见基:《卢卡奇——物象化》,范景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② 批判性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快速扩张源于几个新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大众教育和大学的扩大了的作用;日益增长的对脑力劳动和技术劳动的需要;社会矛盾的强化;在一些国家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等。参见[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

③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更多是精神上的,因而是超时空的。这样一来就很清楚,社会与生物机体的共同点(如把政府比作中枢神经系统、把铁路比作血管等等)最多是一种有趣的类比,它们之间隐含着极大的差异。

④ “在此之前,古典主义自由主义者‘没有表现出任何将根据单一的生活目的而结合起来的期望’,相反,他们‘只有一个更加谦逊的希望,就是在尊重和保护思想实践差异的政治秩序中,我们能够通过不同传统和平和竞争来相互学习……对于他们来说,进步并不在于任何理性计划带给社会的强制前进,而毋宁是人们努力摆脱流行观念的束缚,不再墨守成规,带来不可预知的发展。’”([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曹海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话说,是因为它已经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目的。同样,面对“底层”的知识分子有意回避“历史宿命论”,因为正如一切其他的“宿命论”一样,它不存在任何具体预测的危险,找不到任何证据来加以支持,它代表着历史研究中形而上学对于经验方法的胜利,而这时候的知识分子敢于面对实际社会经验的检验,并且乐于接受自己原先的话语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可能是错误的事实,由此知识分子找到了新的未来面向。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事物的热情参与,一方面寓示了这个群体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愿望,对整体性目标的极度认同;但同时也鲜明地表达了他们与‘修齐治平’、‘兼善天下’精神传统的深刻联系。”^①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底层的人道主义关怀是否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群体的道德必然性?当下的文论界对此产生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讨论“底层”是学院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的结果,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学院知识分子通过这种取巧的方式树立自己的道德自信,通过道德形成了这个阶层的话语霸权,从而获取社会资源”做法的诟病,它超越了“底层讨论”的话题本身,可以说,这也是人们力图取消知识分子表述“底层”的原因之一。但是,对底层的关注到底不只是知识分子道德性的表现,而是个人心理范畴的问题,将其上升为社会普遍现象带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一种新的身份品质,这和社会知识体系崭新的发展形式紧密相关,而且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品质区别开来,“知识分子的性格,首先是关系于它所持载的文化的性格。中国文化精神的指向,主要是在成就道德而不在成就知识。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就,也是在行为而不在知识。换言之,

① 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中国人读书,不是为了知识;知识也不是衡量中国知识分子的尺度;这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是表现得很明白的。”^①所以,在中国的知识传统中,人们更乐意“直抒胸臆”或者“借景抒情”,热衷于从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每一处的幽静中挖掘自己的内心印象,或者沉入另一些代表道德和等级秩序的形象。现在的人们总是在替古人懊恼,说他们把火药做成了烟花而不是武器。的确,所谓的“理性知识”在中国并不占主要部分,因为那些时代的人们确实重视的是内在的精神约束力,整个帝国的集体信仰是首要的,甚至当理性知识触及了统治的道德利益时,就会被无情地视为“恐怖的妖术”。事实上,将知识变成知识分子标志,实用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知识和道德哪个将成为这个群体的标志,这成为区分传统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关键。“在中古时期,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知识与道德都不是分离的,知识从属于道德,是道德的奴仆,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道德(宗教)的存在。然后才是一个知识的存在。”^②需要说明的,道德和知识分子之间必然关系的取消只是意味着道德在现代社会不是精英独有的,尽管知识分子仍然有道德的诉求,但是并不能成为分析这个群体的一个必要前提;况且在知识分子必须向人民学习的年代里,后者而非前者被视为道德的承载主体,而且道德的内涵具有历史性。当然,我们可以想象知识和道德共生所带来的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事实毕竟苛刻,知识分子的“至善”形象和他们精神权威意识相适应,应该说,人们看待知识分子时更加理智,他们是“按照词源的意思使用精英(elite)这个词的。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

① 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民主评论》,1943年第5卷第8期),选自李维武编:《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徐复观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② 许纪霖:《“成为知识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选自王小波等:《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一部关乎命运的争鸣录》,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

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①所以,尽管知识分子的道德指数对这个社会来说相当重要,但是谁又能保证,知识分子中没有坏蛋。

除却道德,也可以说,知识分子对“底层”的关注是他们职业性格的结果。“知识分子的职业人格同时暗示了这个阶层的社会功能。换句话说,职业人格不仅是知识分子从事专业活动的基石,而且是他们社会活动的原则。”^②也就是说,有关人格高尚与否的讨论变成了对这个群体的专业品性分析。当然,职业性并不会取消知识分子关注“底层”的严肃性,尽管“职业”一词带有很强的功利气息。在另一方面,“职业”也意味着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这是现代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职业道德”大大降低了道德背后形而上学色彩,知识分子的身份也有了商业化的气息,但这恰恰是知识分子反思当下社会拥有的力度和深度的前提,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一个部分所发挥的特定作用。尽管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丧失了传统全面的普罗米修斯的能力,不再是拥有特殊人格的道德群体,但知识分子却获取了他们必要的现代属性。知识分子对底层的关注是一种智识惯性,因为在“知识分子常常通过把当前的现实与理想进行比较来判断自己国家和社会制度,而不是把这一现实与其他现实相比较……没有任何人类事业能够丝毫无损地经受这一试验。”^③这种关怀和道德价值是不同的,准确地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不是其本身。但是话说回来,知识分子

① [意]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页。

② 南帆:《知识·知识分子·文学话语》,《敞开与囚禁》,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③ [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